

当代灾害和灾害人类学研究

[美] 安东尼·奥立佛-史密斯 著, 陈梅 译, 彭文斌 校^①

摘要: 灾害是来自自然界、被改变和/或被建构的环境, 以及产生社会经济脆弱性条件的、有潜在破坏性行为的一个过程/事件。灾害研究涉及、影响和关注到一个社会所有方面与环境的关系。环境抵抗性、韧性以及适应性, 已经成为减少灾害对社会实际的或未来的灾害影响的重要理念。在经济、社会、人口、意识形态和科技因素共同作用下, 灾害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错综复杂。重建以及减少脆弱性、气候变化应成为灾害人类学家重点关注的两个版块。灾害植根于人类社会, 怎样从政策研究转移到实践研究, 是对人类学特有的理念和方法的挑战, 作为人类学家, 我们应该做好应对和接受这个挑战。

关键词: 灾害; 灾害人类学; 脆弱性理论; 灾害资本主义; 灾害政治生态学

一、引言

尽管人类学家在 1950~1960 年间做过灾害研究, 但除了个别人类学家写过太平洋岛屿台风和火山爆发现场的文章外, 有关非工业化国家的灾害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几乎没有。几乎所有的灾害研究都集中于欧洲和美国。我们的先驱和导师, 人类学家安东尼·华莱士 (Anthony F. C. Wallace) 基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1956 年) 马萨诸塞州伍赛斯特 (Worcester) 的龙卷风研究, 设计出了一套分析灾害的空间和时间方案。

20 世纪 70 年代前, 人们认为灾害是大自然的突发事故, 或者是上帝的行为, 对其产生的社会缘由知之甚少。如今, 我们理解了灾害是由可识别的社会和物质世界的共同力量推动而形成的一个极为复杂、具有多面性的过程和事件。鉴于此, 灾害研究本身就是多学科的研究。不过, 人类学的整体观更适合于解决灾害的多样性问题。

灾害是来自自然界、被改变和/或被建构的环境以及产生社会经济脆弱性条件的有潜在破坏性行为的一个过程/事件。灾害致使个人和社会在物质生存、社会秩序和文化遗产习惯相对满足性方面遭受可见性的破坏。灾害是涉及环境、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物理和科技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和事件, 在时间的长河中, 这些因素发生变化。从突发事件、迅速的灾害事件和恐怖袭

击事件 (地震、龙卷风、飓风、海啸、洪水、科技事件) 到缓慢发生的灾害事件 (干旱、热波、流行病、饥荒、有毒物接触和冰冻), 灾害的形态各有不同。

灾害研究涉及、影响和关注到一个社会所有方面与环境的关系。通过物质、生物和社会体系运作与人口、群体、机构社会行为实践的相互交汇, 展现社会和环境关系的一致性和差异、协调与矛盾、合作与冲突、霸权与反抗。很少有其他现象能像灾害一样促 (迫) 使研究者和实践者去应对这些诸多正在变化的社会现状。

二、灾害人类学

因为事件和过程囊括了文化、社会、环境的总和, 所以灾害和灾难是一个整体现象。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 其实际的平台, 囊括了人类存在的物质、生物、社会诸方面。它包括了发展和对比的视角。其中, 作为研究方法的一部分, 人类学研究以微观对宏观, 探索社会变化和演进的问题。

人类学的综合视角为探讨灾害发生的整个范畴的原因和影响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且, 灾害为人类学检测社会机构、道德经济政治方面的经济问题, 以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中的核心理论,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景。人类学包含了一套完整的框架, 对灾害理论调研以及理论实践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这是别的社会科学所不具备的。

^①作者简介: 安东尼·奥立佛-史密斯 (Anthony Oliver-Smith), 美国知名灾害人类学专家,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University of Florida) 人类学系资深教授 (Gainesville, 32605); 陈梅, 美国麻省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公共社区服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MA, 02169); 彭文斌,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资深访问学者 (重庆, 400030)。

1996年,我在《人类学期刊年度回顾》(Oliver-Smith, 1996)上发表了一篇回顾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回顾了之前人类学家做过的灾害研究的内容,并讨论了灾害人类学研究的3个主流课题以及相应的子分题:

1. 行为/机构。包括: (1) 个人/机构反馈机制; (2) 文化和重大灾害; (3) 政治、权利灾害和经济学。
2. 社会变化。包括: (1) 重建中的社会机构变化; (2) 政治变化。
3. 政治经济—脆弱性分析。

应用人类学、灾害管理、灾害风险观察和衡量,以及由灾害产生的所谓的“自然实验室”的理论解释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而且,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科学、经济学相互分享方法的趋势也不断增加。自1996年以来,《人类学期刊年度回顾》中灾害人类学方面的文章也大幅度增加。然而,回顾灾害人类学进展的过程并不容易,文章内容信息不详尽,而且更多的研究是对过去17年的研究领域的描述,但对灾害人类学新的承接点,新出现的特征并没有开展。

我说这项工作不容易,至少基于两点原因。

第一个原因: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灾害人类学研究增长迅速,但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蓬勃发展。从1970~1995年的25年间,1篇文献引用数量从不到10多次增长至167次。若不对实际引用的文献做精确的计算,我想过去17年有关灾害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如没有3倍增长的话,至少也有2倍了。例如,2013年度的应用人类学会议,在22个分会上有关灾害研究的文章有103篇。同时,其他语言包括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日语,也涌现出了大量的这类文章。

产生如此大量的灾害研究,背后因素有很多。首先,包括真正严重灾害事件的不断增加,以及媒体报道的增加。例如,从1970年秘鲁地震灾害后几年,大中小不同级别的灾害数量也随之增加,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抵御灾害的脆弱性增强和人口密集度的增加导致的。其次,在1970年秘鲁地震后,标志着主要的国际社会参与救灾和重建工作的开始。再者,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末期,灾害与发展或欠发展,被认为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就把灾害研究扩展到了其他领域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最后,或许是,如我的同事苏珊娜·霍夫曼(Susanna Hoffman)所说,许多人类学家开始发现他们所

研究的社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灾后的社会形态。这取决于你怎么去定义灾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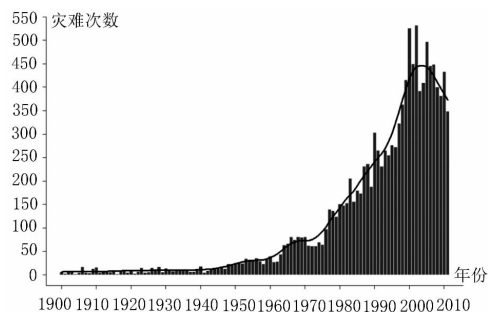


图1: 1900~2011年报道的自然灾害数量^①

第二个原因:调查人类学的灾害研究很难,因为不同学科界限的人为性(或多孔性)的增加。我刚提到分享研究方法趋势的增强,这个比以往提的都更多。现如今,用民族志方法捕捉灾害脆弱性、灾害事件以及灾后恢复的过程得到了认可。不管是好是坏,现在很多人从事民族志研究,一些人类学家甚至从事非常量化的分析工作。

然而,我认为人类学在灾害研究方面的突出特点是纵向的,以过程为导向的。通过不同阶段的影响、灾害紧急程度、救灾情况和重建情况,不仅仅关注事件本事,并且关注一个事件(多个事件)前的风险性和脆弱性,以及个人和集体可操作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关系。而且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强调他们重新所建立的、重新创造的、重新谈判的、摒弃的或者重新复兴的社会关系、文化导向、知识、价值观、习俗和信念。而今,这些研究特点不足以说明人类学家的研究工作。

尽管大多数的灾害研究在时间/空间范围上相对比较狭隘,在20世纪70~80年代间,特别是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灾害所牵涉的远远超越灾害事件本身。灾害是通过时间展现的过程,并且灾害从一开始便深深地嵌在社会历史中。因此,根据实施的重建形式,灾害体现着历史根源、展现的是目前和未来。这些关怀直接关系到人类、大自然以及具有更加持续发展可能的战略形式。

鉴于最近的灾害历史结构特征研究的视角增多,纵向化视角也增多,一些研究从关注一受灾点的单一研究转移到更多的受灾研究点,不仅关注政策、实践,同时也关注政策和实践作用的结果。

1996年以来,在灾害人类学研究领域,部

①EM-DAT: The OFDA/CRED International Disaster Database, www.emdat.be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Brussels, Belgium.

分受到一个有趣且重要视角的汇合的影响，这构成了某种范式的转移。从20世纪70年代起，生态学和灾害研究都致力于解决类似问题，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交汇。尽管这个框架与自然现象产生的灾害行为者最为相关，我还是认为，对关注全部社会危险和风险的研究者来讲，也存在着一种洞察力，进一步促使我们了解灾害是某种具体体系特征和社会其他方面作用的结果。更直白地讲，灾害不是平白无故地发生，它是社会、物质关系体系的特点和特征的表现，尽管这个体系极为复杂。

三、灾害与人类—环境变化的概念

生态科学自20世纪70年代就一直处于转型期，从强调生态系统静态特征转变为时间和空间上表现为动态的、无法预测的复杂系统（Wallington et al, 2005）。经典的生态科学范例基于人类没有干预的理念之上，生态系统被描述成一个理想的、稳定的平衡系统，通过线性发展方法来实现。火灾、虫灾、疾病等干扰因素都被认为是罕见的外来事件，而非系统内部固有的特点。这使得生态系统发展本身变得具有可预测性，因此可以通过减少生态系统的干扰，实现生态管理（Wallington et al, 2005），例如，堤坝、大坝、大堤、河流疏通工程的建设。同理，灾害管理和减灾也一样。

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表明，生态系统的变化相对恒定，长期稳定性非常不足。无论哪种形态，不管是由自然灾害（火灾、水灾），或者人为因素引起的变化都很常见。更为重要的是，动荡被视为生态系统活动性与生俱来的特点，因为其重要性，因此在随后的发展、历史特别是人类历史中，就过去土地使用情况、气候条件、自然干扰以及内部继发的过程的变化模式而言，动荡产生的意外后果成为解决目前生态系统条件的生态分析的重心（Wallington et al, 2003）。就因如此，历史上的意外事故是多方面变化的累积效应的反映。其程度问题很关键，因变化的过程或许是由于不同程度的互相作用力而导致的。新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内部本身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变化，因此研究必须解决多个空间—时间范畴上，所有互相作用的层级。

脆弱性和韧性模式含义宽泛。经典生态学定义生态稳定性为生态系统受到干扰后，回归到平衡状态的能力。这里，重点强调“回归”。相反，非平衡生态学，强调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动态性，认为变化是生态系统的正常现象，并声称变异实际上提高了一个既定的生态系统的持续存

在的概率。

这里讨论一下相关的生态系统韧性。“生态韧性因此是指一个系统承受干扰并保持其功能和控制的能力，或能被系统干扰程度衡量，仍旧能容纳干扰并持久存在。”（Wallington et al, 2003: 15）脆弱性减少或生态韧性的增加，涉及解决生态系统内置能力适应环境干扰问题。因此，生态学新方法要求政策和实践框架包含自然过程里足够大的空间尺度、高程度的自然变化，以及复杂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系统固有的无法预测的行为，霍林进一步认为这种研究流派，与历史性的、分析性的以及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有着最为自然的联系，也是政策和政治需求最相关的流派（Holling, 1993: 553）。

就灾害而言，环境抵抗性、韧性以及适应性已经成为减少对社会实际的或未来的灾害影响的重要理念。

四、灾害与脆弱性

研究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

灾害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同步于过去30年的生态思维发展，到底直接影响到多大程度不是很清楚。社会和环境问题表现得越加复杂和交织，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也更趋于反映出这样的复杂性和系统的研究方法。

直到最近，当然是在我所指的时间范围内，无论是哪一种理论视角——结构功能主义、理性个人行为主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或是后结构主义，主流社会科学自然建设的完整性、综合性规范化与环境建设的直线性、稳定性与环境建设的可预见性，都表现得相当一致（Scoones, 1999: 484）。

但是在20世纪70~80年代间，来自发展中国家且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呼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重新看待灾害问题。他们强调自然灾害并非偶然事件，而是生态系统独有的特征。高死亡率和严重的破坏程度，更多的是社会适应和保护功能的失灵，灾害的根本原因被认为是由于社会风险因子分布不均匀，而非某一个引发事故的地理自然特征引起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死亡和损失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高死亡率和和高破坏率成为欠发达的特点。从本质上来讲，这就是政治生态灾害。

脆弱性/风险的研究方法帮助我们改变了以往认为灾害是和韧性相对的观点，并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去25~30年的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有些帮助。理解脆弱性需要对灾害做更为复杂的理解，

因为灾害并不是由一个单一因子形成的结果,而是由环境和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灾害研究的焦点转移到社会和自然共同相互作用性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和生态学领域的理论发展相一致。新生态学是如何将危害、灾害以及脆弱性连接起来的呢?

都认为风险和干扰是系统化的;

都强调灾害程度问题;

都解决复杂的多层次相互作用;

都需要人类—环境关系的新视野。

事实上,自然与社会关系的二分思维已经改变,到目前为止,这一观念体现了启蒙运动以后长期的西方建构,人类和自然的本质不同体现在科学和哲学论述中。自然和人类是从一个基本的二分思维设立的,其中,我们认为社会是由人类建构和关系集合而成,而自然是“外在”的。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双重性)的二分思维随着社会脆弱性概念的出现而更加具有交互性。自然与社会的交互性,也就是,在灾害分析中,将社会和环境演变一并纳入,并认识到自然和社会两者都被反映在了脆弱性建构中。

但是,在脆弱性方法中,自然和社会共同作用产生社会脆弱条件,因此,这使得理解灾害显得更为复杂,因灾害并非由一个单一的因子引起,而是由环境与社会特征和力量两者以复杂的方式交互产生。

大约在10余年前,基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密不可分,我曾经呼吁重新(搭建)自然—社会的关系来理解灾害,从一种二分性(双重性关系)发展为一种多维(交互性)关系。自然与社会之间彼此折射,影响对方的韧性和脆弱性(Oliver-Smith, 2002)。在这样的理解模式下,人们不仅在危害面前表现得十分弱势,而且灾害更加地成为人类活动的结果,这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上,也体现在人类改变或建设自然环境之上。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如何更好地适应环境的问题,一定是和环境如何遭遇社会活动的问题有联系。灾害比任何现象都最能清楚地说明并使这个交互性问题变得更加明显。

关于灾害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一定包含自然和社会辩证的交互作用。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按照Harvey的说法,即环境是人类经历的社会调停的力量和产物,具有正面性和负面性,犹如社会以环境的这个两面性来表现一样(Harvey, 1996)。

因社会进程的提速,现在可以这样认为,自然环境已不复存在。在各种各样的企划之下,所有的自然进程正与所有的社会进程相互作用……

共同导致全球的、具体的脆弱性问题及相关问题。人类对全球气候影响的环境模式的认可,证实了所有的自然系统事实上都是人类建构的环境。自20世纪起,或许在哪段具体的时间尚可以商榷,我们谈论更多的是人类对环境的“建构”程度,而不是自然或自然体系。有人建议将我们如今居住的新地理纪元时代命名为“人类世”(Crutzen and Stoermer, 2000)。

五、人类学视角的复杂性和所存在的风险

从目前大量的趋势来看,灾害影响程度和范围的增加,确实加深了原本已经复杂多变的灾害问题。在经济、社会、人口、意识形态和科技因素共同作用下,灾害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错综复杂。最近的研究表明,大量的人口比以往在自然灾害面前表现得更加弱势,部分原因是人口增长导致的,但更多的原因是,所处危险的地理位置(Quarantelli, 1985)。海地2010年地震导致超过200 000人的高死亡率,这也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城市的脆弱性特征所导致悲惨状况的一个例证。

人类也创造了新形式的灾害因子和新的脆弱性。确实,每一个科技进步都伴随着一系列的脆弱性与潜在失败的可能。科技总会有失败与失效,引发灾害性的后果。但20世纪后半叶处于新科技大创造时期,且不说其潜在和实际上的功能失效,在一些情况下,光科技应用对环境就造成了灾害性的影响。的确,2011年日本东部地震和海啸引发的可怕的技术后果导致了福岛核电站灾难性事件,这就是技术广泛存在潜在风险问题的案例。再者,全球气候变化成为人类福祉和安全的巨大威胁,该问题必须从地方和全球层面上予以解决。本质上,据预测,如果我们或多或少地按照现状,继续使用化石燃料,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在二氧化碳进入大气使大气变暖前,不进行二氧化碳捕捉,最终造成的后果和地球生物大灭绝时期遭受的后果有些类似。

我们现在居住的文化环境,被贝克(Beck, 1992)称为“风险社会”:一个沉溺于未来并与过去疏离的西方社会。风险社会处于一个风险被全球化的世界(社会)中——一个是其本身具有全球化性,另一个是气候事件的新闻报道在全世界有如闪电般飞快的传播。据吉登斯称(Giddens, 1999),风险社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现代化的两个主要转型:一是“自然”的终结,表现为人类停止担忧自然对人类怎么样,而开始顾忌人类对自然过去的所作所为;另一个是“传统”的终结,对“命运”的服从让步于人类的

主动干预。

对每一种转型都需等候现代性阶段的观点，即贝克和吉登斯（Beck and Giddens）称为的“反省式阶段”，这点我不赞同，但是对考量风险的现代视角如何与灾害影响相关还是非常有用的。比如，贝克认为，风险预示着灾害，灾害是一个还没有出现的条件或影响，因此缺乏形成感知的体验（Beck, 2009: 9~10）。尽管如此，通过将可能的未来实际性的预测，风险因子被未来的灾害大幅度地“预置”（用贝克的术语）或“展示”。气候变化的预测者被描绘成“警示者”，通过把风险作为灾害后果的一个条件具体化，例证了贝克描述的“预置”策略。

六、人类学与当代危害、灾害的动态化

人类学家1995年关注过的大多数灾害问题，继续得到关注。灾害分析在很多情况下得到增强。这里，我着重陈述3种情况。

（一）考古学/民族历史学/历史考古学

作为人类学家，我们不准备把前现代丢弃，也不对历史漠视。考古学家对人类学灾害分析以往有过贡献。近几年美国以及拉丁美洲的研究对以下问题有所关注，比如，受灾后，恢复史前社会文化融合不同层次的能力、过去决策中的环境阈值、古环境交互作用、之前的环境能力、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文化演变、人类对不同文化的管理以及历史对现今的民族志研究的角色，并且，也关注气候变化、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人—人相互作用的问题，并带有可持续性、适应性、韧性、病原体传播以及跨越变化的临界效应的长远视角（www.gheahome.org）。

（二）救灾/重建的微观社会学

近年来，在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支持者以及他们要帮助的社区的复杂关系之间，更多地强调更加适宜的、更加细化的分析。他们的分析关注在跨国部门和当地人口之间，多样的社会行为中的项目设计和执行决策的复杂过程。一些对救灾从业者的世界观，他们的价值观、引导他们的习俗以及当地人民的世界观相互作用分析显示，他们认为灾害不仅显示了帮扶性项目有时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而且也会有经常性的失败。

（三）灾害资本主义

在所有对灾害脆弱性、影响程度的政治经济分析中，最近人类学通过研究整体的重建构思以及具体的项目设计，记录并分析对灾民的持续伤害、结果，这提高了精英群体的兴趣。类似于减少全国干旱的长期战略（巴西和印度），事实上加深了精英阶层对底层社区的控制，这些研究把

矛头指向了在灾害背景下，通过私有化、自由贸易、结构调整、减少社会开支等方式实现新自由项目。紧接着，据娜奥米·克兰的观察，危机为企业资本主义渗透以及社会重建提供了机会（Naomi Klein, 2007）。这些分析记录了此类以灾害重建和减灾为掩饰的资源转移，如遭受海啸灾难后渔民重新安置，把他们的土地卖给旅游业，以及在新奥尔良遭受飓风“卡特里娜”袭击之后，永久关闭公共住宅，将那些设施转移作为私有发展之用（Gunewardena and Schuller, 2008）。

在1995年后，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新的轨迹。同样，在众多的不断展现的新视角中，我集中阐述下面3点：

第一，性别研究。大概除了5~6个前卫的研究，在1995年之前，灾害中的性别问题研究非常少见。尽管性别差异遍及整个社会，影响资源获取途径，一般来说（只引导）男性比女性更有获得资源的优势，研究者们趋向于忽略性别问题。灾害人类学性别研究显示性别偏见，使妇女更容易遭受到灾害风险，更易受到灾害影响而脆弱。灾害人类学性别关系研究展现了性别关系对风险条件、脆弱性、灾害影响以及恢复和重建经验的影响。例如，此类研究显示灾害管理是如何被性别化以及各种帮扶机构如何设计帮扶计划，并将服务传送到以男性主户为的家庭。此类研究强调脆弱性，也强调妇女的能力。文献记载表明，妇女常为性别劳动力分化中受到影响的第一反馈者，同时，妇女也长期服务于受灾家庭。

第二，文化。虽然有许多灾害分主题方面的研究，1995年以后，人类学家更加关注文化的角色，特别是关注人们的灾害经历、灾害影响解释和灾后恢复。人类学研究关注文化，这提醒了我们重建工作不仅是一个物质建设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建设过程。文化重建，不只体现了灾前文化体系，也体现了公众对灾害损失的认知，显示了与主流社会—经济结构的关联。恢复和物质重建关系不大，更为相关的是逻辑感和预测感的重建，而这就是文化最根本的方面。同时，此类研究在对抗灾害影响，以及应付灾后不确定的生存条件两方面，主张主观能动性和控制感的恢复，特别是鉴于穷人在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弱势状况。宗教的角色在解释受灾损失、悲惨状况、文化韧性的发展以及灾后价值重新塑造中有新的贡献。人类学关注文化的同时，也强调在灾后生命价值观重建过程中，礼仪和标志的重要性。

第三，重要的系统安全性。最近，从被称之

为“当代人类学”中，即寻求分析“紧急情况”现象产生的现状……，浮现出了人类学灾害研究的趋势。一些人类学家把此方法应用于分析他们所指的安全问题，即基础设施问题。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每日生活的基础结构，使社会得以正常运转。当代的现实情况现在威胁到了这些基础设施，因此构成了一个安全问题。重要的基础设施保护由3个方面组成：（1）聚焦于一个现代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依赖的重要系统；（2）识别或许为国家安全问题的系统脆弱性和危险性；（3）减少系统脆弱性的科技发展的努力（Lakoff, 2010）。因此，用重要的系统安全性来检验构成当代安全系统的科学技术、推理形式以及政治本体论。他们关注的是作为知识、干预和政治反思的对象，以及安全问题是怎样正在被重新反思的。

七、一项未来的灾害人类学研究议题

尽管大多数灾害研究领域，比如我刚提到的，都值得人类学进一步检验。我建议灾害人类学家应该对两块主要的研究领域引起更多的重视。

（一）重建以及减少脆弱性

我认为，重建和减少脆弱性一起构成了我们灾害研究中最紧迫的问题，因为任何社会科学学科都对此研究最少。重建研究缺少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个过程带给研究者的诸多挑战，但这种挑战却惟独适宜于人类学研究方法。我们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民族志完全适合灾害重建过程的研究，灾害重建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们必须在重建和改造两方面不断调整。说到哪些失去了、哪些会被重建、哪些将会被替代，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兴趣群体和有着不同价值观的人群中都充满了冲突。民族志方法是捕捉当地叙事，与其相伴的是研究人员的观察和参与者的对话，收集当地的知识与信息，分析灾后调整和恢复。

尽管如此，一般认为，灾后重建就是物质方面的建设，而非社会方面。灾害背景下的社会 and 物质复杂性折射在灾害重建的过程里。要关注的根本问题，是灾后如何解决环境、经济和社会变量的复杂性，使得它们具有可持续性、减少脆弱性，让人们在家庭和社区中生存下来。换句话说，重建一定不能再次安装最初产生脆弱性的相同体系。因此，重建需要识别和反映复杂性，重建政策和实践需解决位于任何灾害的核心和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互渗问题。

（二）气候变化

人为因素目前被认为应为全球气候变暖负主

要责任，反过来，海平面上升、冰河、永久冰冻带、寒冷带、北极带冰雪融化，使得地球上某些特定地带或整个地球降雨量加剧、热带和亚热带区域旱灾加重、热浪增加、疾病发生率和范围改变、飓风以及龙卷风活动加剧。生活将会被扰乱、财产受到毁坏、生命丧失。生态服务系统和土地流失及基于自然灾害基础上的气候变化强度增强，频率增加。

生态服务流失包括了食物、水、燃料、营养的损失以及文化元素的丧失，更多的是精神层面和/或者美学方面，它通过与自然特点富有表现力的链接来维持社区。土地沙漠化、海平面上升以及被迫迁徙产生失地。过去50年，由于海平面温度上升、极端天气情况导致的自然灾害也同样加剧。在全球范围内，自然灾害的损失在20世纪后半叶扩大，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Munich Re, 1999: 16）。纯粹从经济方面来看，到20世纪90年代（Renaud et al, 2007: 26），每年因环境灾害导致的损失从39亿美元增加到400亿美元。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以往我们‘百年一遇的灾害’现在越发常见”（Huq et al, 2007: 4）。不仅如此，这些力量中的每一股力量都相互作用、混合，加剧了所有力量的影响。从某种程度来说，前两个过程往往被第三个掩饰，如灾害。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被当做灾害合适吗？不管我们作为分析人员如何看待这个变化，很清楚，受灾人民将会经历这些后果，感受到这就是灾害。

八、总结

最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地理学家、人类学家提出脆弱性理论，他们创造出了用于灾害研究和实践的一个强有力的因果关系模式。脆弱性成为了整个灾害研究领域和管理的导向型原则，但它也并不是自身没有问题。把因果关系置于社会或者社会—环境关系中，不管是从实际的角度还是政治的出发点，灾害研究和灾害活动都变得特别具有挑战性。对于人类学以及其他别的社会科学，脆弱性的概念和风险性让我们解决那些遭受灾害破坏和伤亡的可识别的社会和文化特性，变得具有挑战性，但是，它们也同样让我们面对我们整个人类—环境关系根本矛盾冲突性的困境。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经济体系。挑战和困境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概述：我们如何在这个根深蒂固的体系中，从一个定位社会体系特点因果关系的灾害政治生态学，转移到有实际意义的行动中？也就是说，我们如何从政策研究转移到实践研究？由于灾害和其驱动力

的很深社会根源，人类学特有的理念和方法让我们做好如何回应，这也是个挑战

参考文献：

Beck, U. ,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 Thousand Oaks , CA: Sage , 1992.

Beck , U. , *World at Risk* , Malden , MA: Polity Press , 2009.

Crutzen , P. J. and E. F. Stoermer , “The Anthropocene” , *Global Change Newsletter* , vol. 41 , 2000 , pp. 2~7.

EM - DAT: The OFDA/CRED International Disaster Database , www.emdat. be - Universite , Catholique de Louvain , Brussels , Belgium.

Giddens , Anthony ,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0.

Gunewardena , N and M Schuller , *Capitalizing on Catastrophe: The Globalization of Disaster Assistance* , Walnut Creek , CA: AltaMira , 2008.

Harvey , D. , *Nature , Justic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 Oxford: Blackwells , 1996.

Holling , C. S. , “An Ecologist View of the Malthusian Conflict” , in K. Lindahl - Kiessling and H. Landberg (eds.) , *Population , Economic Development , and the Environment*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4 , pp. 79 ~ 103.

Holling , C. S. , “Investing in Research for Sustainability ,”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 no. 3 , 1993 , pp. 552 ~ 555.

Huq , S , S Kovats , H. Reid and D. Satterthwaite , “Editorial: Reducing Risks to Cities from Disasters and Climate Change” ,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 vol. 19 , no. 3 , 2007 , pp. 3 ~ 15.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 Summary for Policy Makers ,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 Paris: IPCC , 2007a.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 *Climate Change 2007: Climate Change Impacts ,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 Summary for Policy Makers ,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 Brussels: IPCC , 2007b.

Klein , N. , *The Shock Doctrine* , New York: Picador , 2007.

Lakoff , A. (ed.) , *Disaster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vention*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010.

Munich Re , *Topics: Natural Catastrophes , The Current Position* , Munich: Munich Reinsurance Company , 1999.

Quarantelli , E L , “More and Worse Disasters in the Future”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CL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Impact of Natural Disasters: Agenda for Future Action , at Los Angeles , California on July 10-12 , 1991.

Oliver-Smith , A. ,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Hazards and Disasters” ,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 edited by William Durham , Palo Alto: Annual Reviews Inc. , 1996 , pp. 303 ~ 328.

Oliver-Smith , A. , “Theorizing Disasters: Nature , Culture , Power” , in Susanna M. Hoffman and Anthony Oliver-Smith (eds.) , *Culture and Catastrophe: 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 , Santa Fe , New Mexico: Th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 2002.

Renaud , F. , J. Bogardi , O. Dun and K. Warner , “Control , Adapt or Flee: How to Face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Intersections* , no. 5 , Bonn: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Human Security , 2007.

Scoones , I. , “New Ec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What Prospects for a Fruitful Engagement?”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 vol. 28 , 1999 , pp. 279 ~ 307.

Wallace , A. F. C. , *Tornado in Worcester: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Behavior in an Extreme Situation* , NAS-NRC Disaster Study #3 ,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 1956.

Wallington , T , R. J. Hobbs and S. A. Moore ,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Ecological Thinking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 Review of the Salient Issues” , *Ecology and Society* , vol. 10 , no. 1 , 2005 , p. 15; <http://www.ecologyandsociety.org/vol10/iss/art15>.

(责任编辑 段丽波)